

# 陈云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思想及其对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段娟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内容提要:** 陈云立足中国的现实国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领导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把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提高到战略和国策的高度,对加强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他在保护环境、治理污染、森林资源与水资源的保护利用以及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的协调等方面提出的许多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促进了当时环保事业和国土资源保护利用工作的发展,同时对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陈云; 环境保护; 资源利用; 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 F1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61(2015)06-0083-05

**DOI:** 10.13483/j.cnki.kfyj.2015.06.019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新型文明形态,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理念的重大进步。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中共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提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2015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强调要以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重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1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初步完成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布了“十三五”规划的十大任务目标,“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首次纳入五年规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由于许多地方和不少领域未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致使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2012年,我国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11.5%,却

消耗了全球21.3%的能源、45%的钢、43%的铜、54%的水泥;原油、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56.4%和66.5%,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总量已居世界第一。这种经济发展方式若不改变,资源环境将难以支撑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一直以来,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能源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强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情,当前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对解决中国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陈云作为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在长期经济建设实践中对加强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他提出把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提高到战略和国策的高度,保护环境、治理污染、森林资源和水资源的保护利用等政策主张,促进了当时环保事业和国土资源保护利用工作的发展,同时对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也具有重要意义。

## 一、陈云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思想

面对中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分布不均,生产力落后,农业薄弱,自然灾害严重,森林资源和水资源贫乏等问题,陈云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

和中国国情相结合,遵循生态规律,将发展经济同资源环境保护紧密联系起来,对于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资源利用之间的矛盾,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谐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一) 环境保护要防患于先,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陈云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进程中,十分关心环境保护问题。他提出治理污染、环境保护是一大国策,要从战略高度认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他多次强调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一定要统筹兼顾、目光长远,保护好自然环境。对于环境污染的防治,他主张百年计划、防患于先。

“文革”时期,国内环境污染和破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国外环境公害事件也频繁发生,对此,1970年6月26日,周恩来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的负责同志时指出“卫生系统要关心人民健康,特别是对水、空气,这两种容易污染。”针对美日等国发生的工业污染问题,他指出“毛主席讲预防为主,要包括空气和水。要综合利用,把废气、废水都回收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不搞,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搞。”<sup>[1]</sup>此后,周恩来多次强调要注意环境保护问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72年,我国对北京官厅水库污染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治理。同年,我国派代表团出席了有100多个国家参加的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我国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议通过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保工作方针,还制订了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十条规定。1974年,国家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委也陆续建立起环境管理机构,以及环保科研、监测机构,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开始起步。陈云在“文革”期间协助周恩来工作时,对环境问题也特别关注,提出了防患于先的思想。1975年6月至8月,陈云到全国各地进行经济工作调查。他在扬州听取江苏省石油勘探指挥部负责人关于真武地区勘探情况的汇报和视察石油钻井时,鼓励石油工人要搞好地质情况的勘探,不要一碰到困难就灰心;同时指出要注意环境污染问题,在生产设计的同时就要做好防止污染的设计,不要等到事后再解决<sup>[2]</sup>。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随着农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解放,乡镇企业得到了蓬勃发展。1984年,全国乡、村两级企业已达165万个,从业人员已有3800多万,当年总产值为1433亿元,实现纯利润128亿元,上缴国家税金达79亿元。整个乡镇企业全年总产值已超过1700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以上,相当于1957年的全国社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24%以上,相当于1964年的全国工业总产值。到1985年底,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已达6000多万人,总产值2300多亿元,接近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20%,接近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0%,占农村社会

总产值的50%左右,给国家上缴税金120亿元。乡镇企业的兴起成为振兴我国农村经济的重要途径,为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开辟了广阔前景。然而,乡镇企业带来的大气污染和水体污染问题也不容忽视。1983年,乡镇企业硫磺产量达11.5万吨。在采矿烧硫过程中,资源平均利用率不到20%,有80%的硫和大量的铁以“三废”的形式排入环境。据调查,每炼1吨硫磺,所排的硫化物达1.8~2.2吨,含铁30%和含硫2%的黄渣80吨,使炼硫区黄烟笼罩、毒气熏人,废渣堆积如山。乡镇企业还带来了水体污染。1983年全国乡镇造纸企业有210多个,从业人员13万余人,生产的机制纸及纸版137万吨,占全国同期总产量661万吨的21%。造纸工业每生产1吨产品约排放400~500吨废水和60~250吨生化耗氧量以及100~200千克悬浮物,且小造纸厂碱回收率平均仅20%左右,往往一个小造纸厂造成一条小河全被污染<sup>[3]</sup>。

对于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发展中的环境保护问题,陈云非常重视,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1979年6月17日,陈云在致李先念、姚依林的信中,讲了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是水资源问题,二是工业污染问题。他指出“现已办了的工厂,哪些还未处理污染问题的,我们应该心中有数,逐步加以改变。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患于先,这是重大问题。”<sup>[4]</sup>1982年10月26日,陈云将新华社题为《上海出现酸性雨污染环境》的内部材料批转胡耀邦、赵紫阳,并在批语中指出“治理费要放在前面。否则后患无穷。”<sup>[5]</sup>1986年5月18日,陈云在视察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时,为宝钢长江引水工程水库题名“宝山湖”,同时指出随着工业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要注意保护环境,一定不要使黄浦江水系受到污染<sup>[6]</sup>。1988年8月25日,陈云为纪念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召开和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开创十五周年题词“治理污染,保护环境,造福子孙后代”<sup>[7]</sup>。

(二) 环境保护是一大国策,要加强宣传、增加投资、层层负责

1988年8月27日,陈云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两篇反映环境污染情况的内部材料(这两份材料是新华社记者写的《“卫星看不见的城市”——本溪市环境污染情况调查》和《人民日报》记者写的《四川排放污物总量约占全国十分之一》)批转李鹏、姚依林等,并在给他们的信中指出“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要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请告诉有关部门,这方面的材料,以后注意送给我看看。”<sup>[7]</sup>198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篇题词。

陈云对环境保护工作提出的三点意见,促进了环保课题的

提出。根据陈云对环保工作所做的重要指示,国务委员、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健提出了治理污染的三大课题。宋健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确立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结合起来的总方针,颁布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但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还很严重,环境保护的任务相当艰巨。当前有3个突出问题需要解决<sup>[8]</sup>。一是要切实提高对于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时的认识。无论哪个省、市、部委和企业,都必须在本职工作中切实落实这项国策。在工业特别是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必须从一开始就要注意环境保护。否则,以后就积重难返,治理时要付出十倍、百倍的代价。二是要广开资金渠道治理污染。除了继续严格实行“谁污染,谁治理”的政策之外,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都要把治理环境和防治污染列入发展计划,同步实施。还要把控制污染列为考核企业上等级的一个条件,加强企业治理环境的责任感。三是要继续建立和完善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强化环境管理,逐步完善加强各级环境科研、监测机构。环保部门要严格依法办事,大胆管理,担负起国家和人民赋予的光荣职责。宋健认为,解决以上3个环境保护面临的中心课题,也是落实陈云同志3条意见的重要措施。

陈云提出的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一大国策的思想,也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环保政策和环保工作的逐步完善。198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家环保局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中分出,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以加强全国环境保护的规划和监督管理。1989年4月底召开的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确立了环境保护的“三大政策”和“八大制度”。会议同时提出“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的“三同时三统一”环保目标以及“努力开拓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的意见。1990年国务院要求宣传教育部门应当把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列入计划。1991年国家教委讨论把环境科学列入一级学科。1992年,全国除西藏、青海等少数省、自治区和台湾省之外,均开展了排放水污染物许可证发放工作。1993年开始在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试点建立环保投资公司。1996年8月,国务院出台《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抓紧建立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体系和定期公布的制度。强调到2000年,全国所有工业污染源排放污染物要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标准。《决定》还提出在1996年9月30日以前,对现有年产5000吨以下的造纸厂、年产折牛皮3万张以下的制革厂、年产500吨以下的染料厂,以及采用“坑式”和“萍乡式”“天地罐”和“敞开式”等落后方式炼焦、炼硫的企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取缔;对土法炼

硫、炼汞、炼铅锌、炼油、选金和农药、漂染、电镀以及生产石棉制品、放射性制品等的企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其关闭或停产。对逾期未按规定取缔、关闭或停产的,要追究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及有关企业负责人的责任<sup>[5]</sup>。对于乡镇企业的环境治理,1997年3月,国家环保局会同农业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联合制定发布《关于加强乡镇企业环境保护工作的规定》,强调要对乡镇企业的环境保护工作实行统筹安排、分类指导;对乡镇企业的污染防治要体现加强管理、预防为主方针。同时国家环保局还联合农业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组织开展了全国乡镇工业污染源调查。根据《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要求,全国共取缔、关闭、停产6万多家污染严重的小型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

### (三) 遵循生态规律,重视森林资源和水资源的保护利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对自然有高度的依存性,“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sup>[10]</sup>。人类劳动要受到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制约,生态系统的平衡取决于人、自然、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具体实践中,陈云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说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提出在经济建设中要遵循生态规律,重视森林资源和水资源的保护利用。

在旧中国,森林遭到严重摧残和破坏。新中国成立后,40多亿亩荒山荒地和连年的水旱自然灾害,再加上山区群众烧垦、开荒,使森林资源显得非常贫乏。为了实现森林资源的持续利用,1950年3月19日,林垦部颁布了《关于春季植树造林的指示》。1950年4月1日,陈云在全国林业会议情况的报告中指出:林业工作方针,应以普遍护林为主;其次,在风沙水旱灾害严重地区选择重点造林。同时,在各森林区制定合理的采伐计划<sup>[11]</sup>。1950年5月,政务院在《关于全国林业工作的指示》中确定了“普遍护林,重点造林”的方针,要求各地严格禁止一切破坏森林的行为;在风沙水旱灾害严重的地区,根据条件有计划地进行造林,封山育林。1951年12月,陈云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森林失火和滥砍滥伐的现象,正在引起地方政府和人民的注意,但还需继续努力。今年造林300多万亩,若干地方也开始营造防风林、防沙林,华北、山东的部分地区开始了封山育林,但是总的说来,规模还是不大的。我们希望由此积累经验,为长期的大规模的造林计划做准备”<sup>[12]</sup>。1957年7月17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有林区实行“以林养林”的财务制度时指出:林业是个大问题,根据我国情况,解决林业问题的出路主要靠造林。个体造林、合作造林、国家造林的办法都可以用<sup>[13]</sup>。1961年9月27日,陈云在主持中共中央工业支援农业小组会议的讲话中指出,造林是国家百年大计,它既与农业增产有关,又与工业建设

有关工农业生产都离不开它<sup>[14]</sup>。1961年11月24日至12月17日,陈云在听取冶金工业座谈会汇报时指出:今年木材不够,煤矿要用混凝土代替7万立方米的木材。生产建设有10年8年为周期的,也有50年100年为周期的,植树造林就是以50年100年为周期的。植树造林既可提供工业原料,又可改变气候<sup>[15]</sup>。陈云保护森林资源的政策主张对当时我国林业工作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年,国务院批准在西北、华北北部、东北西部营造“三北”地区防护林体系;198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1984年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森林法》,中国森林资源保护工作建设迈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据全国第三次森林资源清查资料显示,全国林业用地面积为26743万公顷;森林面积为12465万公顷,其中针叶林5241万公顷,阔叶林5483万公顷,经济林1374万公顷,竹林366万公顷;全国活立木总蓄积量为105.72亿立方米;森林蓄积量为91.41亿立方米,其中针叶林49.81亿立方米,阔叶林41.60亿立方米;全国森林覆盖率为12.98%<sup>[16]</sup>。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贫乏的国家,陈云一向也非常关心水资源的保护利用问题。1951年5月16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作关于财经情况和财经工作要点的报告中指出:全国水量平均起来并不多,从长远看,要以蓄为主,蓄泄兼顾。要修水库,筑塘堰,山区更要种树种草,保持水土,华北、西北地区还要多打水井。水利建设是治本的工作,是百年大计<sup>[17]</sup>。1956年1月20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作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生产问题的发言时强调,要实现1967年粮食亩产目标,从全国看,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水、肥料和人力的合理使用,其中关键是水<sup>[18]</sup>。1960年10月,他在同河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解决中国农业问题,水是很重要的,一取天然之水,二取地下之水,三取外来之水。河南水不够,需要从南方借水,要研究水的来源问题<sup>[19]</sup>。1975年7月16日,他在扬州视察江都抽水站时指出:南水北调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在条件允许时应当进行。这是一个大工程,要有长期规划。由于我国目前财力有限,工程只能分段进行<sup>[2]</sup>。1979年6月17日,他致信李先念、姚依林,提出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水资源和工业污染问题。其中关于水资源问题,他指出:农业、工业和人民生活都要用水,有些地区如京津地区,水资源已很紧张。今后工厂的设立必须注意到用水量,即使有水源的工厂也应有节水办法<sup>[20]</sup>。1990年6月6日,他将水利专家张光斗和陈志恺合写的《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一文批转江泽民等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并在批语中指出:张光斗、陈志恺同志就我国水资源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之后,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见。水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各级领导部门,尤其是经济、科技

领导部门,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以逐步扭转目前水资源危机的严重状况<sup>[21]</sup>。6月10日,江泽民做出批示,在考虑八五规划时得认真研究一下水的问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应该未雨绸缪<sup>[22]</sup>。1990年年底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针对水资源问题做出论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长江、黄河的水灾仍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今后要加强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防洪、蓄水、引水的大中型项目,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抓紧进行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缓解北方水资源紧缺的矛盾<sup>[23]</sup>。陈云关于水资源保护利用的政策主张以及中共中央关于资源保护的一系列政策文件的颁布,促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八五”期间,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和北江飞来峡水利枢纽相继开工建设;建成了黄淮海平原灌溉、引大入秦等一批水利工程;农村人畜饮水工程建设有了较大发展。农田灌溉面积净增200万公顷<sup>[24]</sup>。

## 二、陈云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思想对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当前,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强调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在这些重要理论和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环境保护和生态资源利用工作取得较大成效。但同时,我国环境状况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部分区域和城市大气灰霾现象突出,一些重点流域、海域水污染严重,许多地区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容量,农村环境污染加剧,部分地区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制度建设尚不完善,环保投入仍然不足,公众参与意识不强,监管能力也相对滞后。为更好地推进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当前我们应充分借鉴陈云长期倡导的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等思想,转变发展思路和路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第一,调整优化结构,强化创新驱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当前,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201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161个城市中,仅有16个城市空气质量年均值达标,145个城市空气质量超标。近年来,我国接连发生水污染事件。全国470个开展降水监测城市(区、县)

中 酸雨城市比例为 29.8% 酸雨频率平均为 17.4%。4 896 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水质优良级的监测点比例仅为 10.8% [25]。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陈云提出的环境保护要防患于先,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思想在当前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面对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的新常态,应改变过去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发展路径,改变过去认为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依然相对较大的思想认识,清醒认识当前保护生态环境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把调整优化结构、强化创新驱动和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淘汰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三高”产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第二,加强环保宣传,增强公众参与机制,提升公众环保意识。公众参与是保护与治理环境的关键。在环保事业中,要加强宣传,努力提高公众积极参与的意识,扩大公众参与的程度。陈云提出的“治理污染,保护环境,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的政策主张,对提升公众环保意识依然具有启示意义。当前,要完善并广泛宣传公民相关权利的法律规定,保障公民有效行使其在环境健康权、知情权、检举权、参与权等方面的权利;扩大相关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加强对生态文明的舆论引导和公众监督;扩展公众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决策的途径和方式,开展重大环境政策、规划和法规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价;充分发挥政府组织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整合作用,健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相关部门和民众自发组成社会环保组织,建立政府主导下社会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生态治理运作模式。

第三,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实施中的监管力度。近年来由于政府行政效能不高、执法力度不够,往往影响生态文明制度实施中政府环境监管的权威性及有效性的发挥。陈云提出的“治理污染,保护环境,要层层负责”的政策主张启示我们,要改变过去一些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落实不到位的状况,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生态文明建设指标纳入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创新监督考核制度,督促地方政府提高环境质量;要建立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问责制和终身追究制,以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结果和生态环境损害情况为依据,明确对地方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追责情形和认定程序。

第四,完善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利用制度。根据《2010 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报告》分析,我国森林蓄积居巴西、俄罗斯、美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加拿大之后,列第 6 位;人均森林蓄积 10.98 立方

米,相当于世界平均人均占有量的 14%。我国森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质量不高、分布不均的状况还未得到根本改变,森林资源的保护利用还面临着压力和挑战。由于节水意识淡薄,水利利用率低,节水灌溉技术落后等原因,我国水资源也较为短缺,我国目前年均水资源量为 28 000 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量为 2 000 立方米,只占世界平均水量的 1/4。为了更好地保护自然生态资源,当前,要充分借鉴陈云提出的资源保护利用思想,树立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构建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的资产和负债核算方法,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定期评估自然资源资产变化状况;健全用水总量控制制度、节约集约用水机制、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度,保障水安全、促进水资源使用结构调整和优化配置;建立天然林保护制度、国家用材林储备制度、国有林场公益林管护机制以及完善集体林权制度,健全林权抵押贷款和流转制度,大力保护森林资源。

#### 参考文献:

- [1]李琦.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回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332.
- [2][5][6][7][14][15][19][20][22]陈云年谱(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98,308,393-394,414,96,102,45,248,434.
- [3]彭天杰.我国乡镇企业的污染现状与环境保护对策[J].环境科学丛刊,1986,7(5):30-31.
- [4][21]陈云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2,375.
- [8]陈云提出环境保护三点意见——宋健阐述治理污染的三大课题[J].中国环境管理,1988(5):1.
- [9]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85.
-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5.
- [11][13][17][18]陈云年谱(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44,391-392,98,285.
- [12]陈云文集(2)[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314.
- [16]中国农业年鉴 1990[Z].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0:38.
- [23]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84.
- [24]中国水利年鉴 1997[Z].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7:2.
- [2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N].2014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5.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七卷)”(编号:MY02\_2015\_SCX\_1221)。

[作者简介]段娟(1977—),女,湖北天门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收稿日期]2015-10-20

责编:董积生;校对:暮雪